

全球文明倡议的理论基础、价值意蕴 与实践探索

张倩红 王铁铮 丁俊 李洪峰

内容提要 全球文明倡议作为新时代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创新与实践，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方案。全球文明倡议突出了“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文明传承和创新”“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倡导弘扬人类共同价值”之要义，而摒弃了西方渲染的“文明中心论”“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承认文明在个体上的差异性，但同时强调人类文明完全可以在尊重理解的基础上碰撞交融、和谐共生。世界文明发展史证明，融通并进是人类文明交往的主旋律，且需要在同异质文明的不断对话中摄取养分，实现自我更新和文明的升华及发扬光大。中阿文明交流互鉴致力于探索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形成更多交汇，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人文滋养和精神资源。中非文明互鉴是世界不同文明对话的典范，中非国家间的互利交往体现了双方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尊重和对文明平等的认知。未来，中非文明互鉴在哲学思想和发展理论构建、文化创新合作、经验传播和分享路径方面，将继续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 全球文明倡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 文明交往论 中阿文明交流 中非文明互鉴

作者简介 张倩红，郑州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王铁铮，西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丁俊，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洪峰，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

全球文明倡议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创新与实践

张倩红

2023 年 3 月 15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核心内涵是肯定文明的多样性、包容性，倡导文明和合共生、交流互鉴，目的是“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① 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当代阐释与实践探索。

一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核心要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思想散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历史学笔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手稿》等一系列著述中。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形成于 19 世纪中叶，其核心要义可大体概括如下。

第一是文明产生的实践性。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许多文明理论流行于欧洲，有的仅仅把文明归结为“思想意识”“摆脱野蛮的进步”，黑格尔把文明看作是“绝对精神”的体现，当时几乎所有的文明理论都无法阐释文明产生的动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② 社会实践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因，科技发展、阶级斗争、人的主观能动性都会成为文明发展的推动力。换句话说，人类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掌握了技术，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才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创造出文明的要素与特征。可见，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本质特征是以历史唯物主义

^①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2023 年 3 月 15 日，北京），载《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16 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 666 页。

为基础，把文明发展置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总过程，极力呈现文明的唯物性、实践性，反对唯心空泛的文明观。

第二是文明形态的发展性。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肯定人类文明形态的整体性，另一方面强调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传承性，认为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是前一阶段文明成果的积累与传承，文明形态的演进依托于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演变发展。文明的变迁具有阶段性和长期性，其基本趋势是“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从文明社会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到共产主义文明社会”，而共产主义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高层次文明形态。三次文明形态的转型契合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人无疑是文明的主体，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是文明发展的应有之义。

第三是文明交往的普遍性。“交往”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文明存续的重要条件在于交往，“交往革命”会赋予社会全新的内容，从而促进文明的跃进。他把交往分为“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内部交往与外部交往、个人交往与群体交往、地域交往与世界交往等，但“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是两种最基本的交往方式。在马克思看来，交往也是文明社会成长的基础：“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发达程度。”^① 马克思还强调，交往使不同文明融入了世界舞台，“地域历史”也变成了“世界历史”，即“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②

第四是文明价值的平等性。马克思认为，文明是一种内在的、不断进化的历史过程，因民族、国家、地域、时空、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差异，导致多种文明形态的存在，但所有文明在价值判断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东方文明的价值与东方社会的发展逻辑，反对把东西方对立起来的“野蛮—文明”话语模式，尖锐地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

② 同上书，第168页。

弊端，认为资本主义文明绝非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产生新文明的社会因素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断孕育。

总之，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不仅揭示了文明的本质，探讨了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而且从唯物史观出发，把文明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世界历史的形成贯通在一起，因此，与同时期的各种文明理论相比具有其科学性、先进性。20 世纪，以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为代表的文明形态理论在欧洲兴起，成为影响巨大的历史哲学。西方文明形态史观展现了人类文明演进的不同模式和多样性特征，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基本一致，但二者仍存在本质上的分歧，即“唯物”与“唯心”之别。20 世纪中后期以来，一些西方学者一直致力于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捍卫马克思主义文明观，驳斥西方文明形态史观，反对将宗教、哲学等思想观念视为文明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以实践观基础上的文明本质论否定文化悲观主义、历史终结论。正是在与西方文明形态理论的辩论与博弈之中，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得以传承与发展。

二 全球文明倡议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创新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① 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围绕文明交流互鉴与多元发展、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以及推进全球文明进程发表了一系列讲话，阐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观，尤其是全球文明倡议的发布产生了深远影响，既呈现了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与逻辑理路，也反映了新时代中华文明的新成就、新特征。习近平主席的文明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尊重多元文明。习近平主席指出，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从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书写了激荡人心的文明华章”。^② 习近平主席认为，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 63 页。

^②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载习近平著：《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年版，第 98 页。

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因此，全球文明倡议强调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

第二，强调文明传承与创新。习近平主席指出，任何文明都是人类创造的成果，“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基于这样的理念，全球文明倡议强调“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①

第三，倡导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主席以乐观主义态度强调文明发展的进步性，坚持人类文明发展的逻辑理路与价值追求，强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共享一个地球，必须树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我们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②

第四，注重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我们需要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我们承认文明有差异，但差异不应该成为引发冲突的根源，“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在当今时代，文明交往已成为常态，“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全球文明倡议强调要“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③。

第五，体现文明自觉意识。自觉意识是从人类的整体出发，在处理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各种关系时所表现出的全局意识、所选择的正确姿态。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强调“内部的自我表达和自决”^④，充分肯定人在文明传承中的作用，强调人文精神、文明自觉与文明成长的关联性。中国世界史专家彭树智先生也指出：“文明自觉是人类最强大的力量。文明自觉把文明

①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2023年3月15日，北京）。

② 同上文。

③ 同上文。

④ [英国]阿诺德·汤因比著：《历史研究》（上），郭小凌、王皖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页。

交往互动的客观规律通过实践的主观能动性融合为一体，形成整体的合力。这种综合能力是人类文明自觉的集中体现。”^① 在全球化时代，自觉意识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全球文明倡议是促进全球文明进步的中国方案，其思想理念与价值取向是一种尊重他者的态度、提升自我的定力、共享未来的智慧，归根结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与文明自觉。

总之，习近平主席有关文明的论述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一脉相承，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文明的定义与内涵、文明成长与演变、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等思想精华，在不同语境下呈现了马克思所强调的文明的实践性、开放性、等价性以及文明交往的普遍性等特征。另一方面，它又结合新时代中华文明的新形态、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及人类文明发展的共有困境，阐释了不同文明和谐共生、人类命运休戚与共、世界文明同频共振的内在机理。

三 全球文明倡议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实践探索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创造了丰富的文明成果，但也面临更大的生存挑战，地缘政治环境更加复杂，文明冲突话语此起彼伏。应以何种态度应对世界大变局、处理本体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也成为各国政府需要面对的话题。2014 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历史性演讲，阐释了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被国际舆论誉为“新文明观”，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2014 文明宣言”。习近平主席 2021 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 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议，2023 年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这三大倡议是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中国方案，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最新成果。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倡导不同文明携手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实践运用。

第一，全球文明倡议体现了以和平为基础的外交哲学。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承认文明在个体上的差异性，但同时强调人类文明完全可以在尊重理解的基础上碰撞交融、和谐共生。新中国成立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全球文明倡议以和平共处为根本，体现了利益共享、责任分担的共同体意识。习近平主席是在文明平等的前提下，以彼此尊重为基础，以交流互鉴为准则，提供超越文明冲突、塑造和平世界的中国智慧。正

^① 彭树智著：《老学日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 477 页。

如他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所讲的：“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①。

第二，全球文明倡议体现了以发展为根本的外交实践。全球文明倡议提出的背景是在与世界政党的高层对话会上，其宗旨是呼吁世界各国“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促进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正如非洲学者丹尼斯·穆尼内（Dennis Munene）所评论的：“全球文明倡议所倡导的尊重不同文明的不同文化实践已经并将持续促进国际社会和谐合作、彼此包容，也为和平共存提供了行为准则。通过全球文明倡议这一思想性的公共产品，习近平主席为世界分享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程中的经验智慧，旨在帮助世界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原则，鼓励 21 世纪各国文明在差异中进行文化交流，实现国际社会稳定。”^②

第三，全球文明倡议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同行的外交理念。习近平主席的三大倡议贯穿了一个根本性的宗旨，即世界文明的发展不以牺牲他者为代价，中华文明的发展要与世界文明融通并进。中国文化传统中“以和为贵”“天下一家”的理念根深蒂固，“国虽大，好战必亡”是先贤们的智慧良言。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要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开展人文交流、国家合作，构建对话机制，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理念引领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与发展导向，反对零和思维与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

综上所述，全球文明倡议是把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应用于当今中国的外交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来阐释当代世界文明的发展逻辑与价值理念。如果说马克思的文明观是对社会发展、历史演进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在联系与外在互动的唯物的、辩证的科学判断，那么习近平主席的文明理论则是结合中国实际与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诠释与时代表达。全球文明倡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维，也是提升全球治理、回应人类现

^①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 年 5 月 4 日），载《人民日报》2018 年 5 月 5 日。

^② 陈密容：《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世界发展进步》，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 年 5 月 26 日。

代化之间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自觉意识与世界情怀。因此，不断探索全球文明倡议的理论价值，领悟其现实意义是当代学人的责任与使命。

文明交往论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摒弃与突破*

王铁铮

一 “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及影响

1993 年夏，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季刊发表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教授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他认为“在这个崭新的世界形势下，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人类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着全球政治。”^① 他由此断定，文明的冲突作为世界政治的核心因素正在取代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而且只有从文明冲突的角度才能更准确地解释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儒学国家与伊斯兰国家正在进行合作，从而对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权力构成了挑战。在文章结尾，亨廷顿以政府战略谋士的身份建议美国政府联合同类文明，利用儒学国家与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冲突，限制儒学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扩大军事力量，打击儒学和伊斯兰教，从而遏制异类文明的挑战。^② 亨廷顿由此成为鼓吹“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

亨廷顿的文章发表后，立刻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外交事务》的后续报道称，这篇文章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该杂志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所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亨廷顿亦承认这篇文章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他所撰写的其他任何文章。^③ 亨氏的所谓“新理论”一时在西方大受喝彩，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2021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新编中东国家通史（多卷本）”（LSYZD210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p. 22.

② *Ibid.*, p. 49.

③ [美国] 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前言，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 页。

一些学者甚至对其做了进一步发挥。2000年，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与美国的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ndt）合作撰写了《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他们认为帝国正在成长成为一种全球政治新秩序，也是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帝国将有效控制全球交流，它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①另一位美国学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则在其2002年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强调，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寻求权力的最大化，因此不可能有权利均衡的机制，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②21世纪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更是极度崇尚军力，以建立美国“仁慈霸权”、输出美国式的民主与价值观作为其核心主张。上述理论和观点在“九一一”事件后，随即成为美国小布什总统“先发制人”理论的基础，以及接连发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重要依据。2002年6月1日，小布什总统在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将其归纳为三大原则：一是美国要保持“先发制人”的权力；二是美国价值观是普适全球的；三是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这三大原则也是小布什任内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基石。

二 “文明冲突论”的本质

亨氏等人的理论完全是一种变相的“冷战思维”模式。事实上，一些理性的学者和政治家对“文明冲突论”持有怀疑或否定态度。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研究员沃尔特·克莱门斯（Walter Clemens）就撰文指出，亨廷顿夸大了文明差异的影响。他认为，我们“这个世纪的大冲突都不是文明冲突引起的”“文明之间的裂缝比之国际事务中的其他一些因素，只是第二位或者第三位的。现在同以往一样，国家之间的合作或者冲突是以设想的利益为基础的。互相依存的关系和技术的发展使不同文化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和有利的事。”^③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等人认为，强调冲突、分裂和对抗无

① [美国] 迈克尔·哈特、[意大利] 安东尼奥·奈格里著：《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② 参见 [美国]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大国的政治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转引自汤一介：《“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41卷第6期，第8页。

③ Walter Clemens, “Interest Clash but Civilizations Can Cooperat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7, 1997, p. 27.

益于改善世界上各个国家间的关系，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制造骇人听闻的矛盾，而是要强调新环境下文明间的协作。亨廷顿过于强调冲突，忽略了文化和文明本身具有的相似性和可变性。不过，在西方学者中对“文明冲突论”持最强烈和最全面批判态度的，莫过于德国政治学家、曾任德国黑森州和平与冲突研究基金会主席的哈拉尔德·米勒（Harald Müller）教授，他专门撰写了《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一书。该书针对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主要观点，是通过大量史实从正面反驳了将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单地套入“敌我对抗”的亨氏模式，并指出：主宰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强大推动力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危险，但同时它也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使人类各民族之间的危险敌对性有可能得以调和，即文明的冲突现象并非自然之力的结果，而是人为引起的，因此人类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来逾越这个障碍。^①但透过米勒教授主张的以“文明的共存”替代亨氏的“文明的冲突”的表象，人们仍会感受到两者之间在目标上则是相同的，只是在如何达到目的的方式方法上存在分歧，特别是在有关中国的论述中，其偏颇看法竟如出一辙。^②

从根本上说，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提出无疑是为美国新时期的全球利益服务的，并折射出美国在后冷战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试图借助一种臆造的“新理论”继续实施对外干涉，充当世界警察的强烈意愿。特别是将海湾战争后，中东地区再度兴起的伊斯兰潮片面而机械地被演绎和渲染成所谓“伊斯兰威胁论”，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当代伊斯兰潮中不代表事物主流的某些极端行动人为地无限扩大了，其真实目的就是要在后冷战时代寻找一个能够替代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新的假想敌，从而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进一步遏制发展中国家和维护其世界霸权利益。

三 交往超越冲突的人类历史发展见证

价值观和政治出发点的不同决定了理论观点的迥异。关于文明交往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文明观认为，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普遍交往是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根本出路与方法。而不同文明之间的

① [德国]哈拉尔德·米勒著：《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郗红、那滨译，前言，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② 同上书，译者后记，第300页。

冲突，并不是无法克服的，也不是永久存在的，应注重不同文明体之间交往与融合的广度与深度，通过交往互鉴实现共同促进和发展。习近平主席对文明交往的意涵提出了精辟的见解。2014年3月27日，他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他还对“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这三个议题给出了高屋建瓴的归纳和诠释^①，体现了不同文明交往互鉴的真谛和本质。对于这一点，彭树智教授作为国内文明交往论的主要倡导人和先行者，在其所著的《文明交往论》一书中曾指出：“文明交往形成的交往力，同生产力相互作用，分别组成了人类社会进程中的横线和纵线，彼此交叉壁联，织成了色彩斑斓的多样性历史画卷。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不同性质的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矛盾交往运动，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水平的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一起，推动着历史的前进。”^② 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也充分验证了上述观点。

中东自古是多元文明汇聚、碰撞与融合之地。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古波斯文明作为各具特色的三大本土古文明，无一不是伴随历史的变迁，在与不同文明互为杂糅和兼容并蓄过程中不断增光添彩、丰富自身，并为世界文明做出突出贡献。以早期的文字发明为例，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体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对源于西亚的腓尼基字母文字的形成，以及在腓尼基字母基础上演变而来的阿拉米字母、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都产生了重大影响。^③ 而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500年发明的“楔形文字”则促进了西亚诸多民族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阿卡德人、阿摩利人、亚述人、埃兰人、赫梯人、胡里特人、米坦尼人、乌拉尔图人等都对楔形文字略加改造来表达自己的语言。^④ 古埃及早期的象形文字也深受楔形文字的影响。古波斯文明晚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波斯人创立了基督教诞生前在中东最具影响力的琐罗亚斯德教，其教义主张的善恶二元论，末世学说、死而复

①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第97~99页。

② 彭树智著：《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③ 刘文鹏主编：《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④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古代史》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

活、救世主降临和末日审判等观念，在琐罗亚斯德教同犹太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交往中都被它们不同程度的接受，同时对古希腊哲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① 古波斯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文化等典章制度文明，尤其是波斯帝国和萨珊王朝的专制政体则成为后来的中东各帝国和王朝纷纷效仿的样本。

在中东进入持续近 300 年的“希腊化时代”（公元前 334 年～前 30 年）和罗马人近 6 个世纪的统治时期（公元前 146 年～公元 439 年），域外异质文明同中东本土文明的交往进一步加强。希腊化文明就是一种融汇了古代东西方文明诸因素后形成的混合型文明。研究者认为，“希腊人所借用的文明成果，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最终都烙上了希腊人独有的智慧的特征。”^② 然而，希腊化文明的东方根基却是不能否认的。正如美国著名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所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③ 上述史实揭示了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和融汇传承关系。法国的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其《文明史纲》一书中指出，“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毫不流动地存续下去，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了丰富。”^④ 而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Russell）早在 1922 年访问中国后，亦曾在《中西文明比较》一文中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⑤

中华文明具有 5 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崇尚和平，弘扬平等、对话、包容、互鉴的文明观是中华文明的本质属性，也是中华文明绵延持续、历久弥新的基本要素。张骞凿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启动中国与阿拉伯和波斯交往的大门；玄奘天竺取经，推动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鉴真东渡日本，汉文化传入东瀛；郑和七下西洋，拓展中西贸易和文化往来。特别是印度佛教的传入及其在华夏大地生

① 刘文鹏主编：《古代西亚北非文明》，第 402 页。

② [美国]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上册，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09 页。

③ [美国] 乔治·萨顿著：《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 年版，第 64 页。

④ [法国]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文明史纲》，肖昶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30 页。

⑤ 转引自陈启能、姜芄等著：《文明理论》，总序，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第 4 页。

根开花，最终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的互动性融合，从而构筑了延续至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华文明正是在不断的历史交往中走向进步和强盛。文明的演进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这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上的文明范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任何文明也不可能尽善尽美，需要在同异质文明的不断对话中摄取养分，实现自我更新和文明的升华及发扬光大。

面对文明交往的发展趋势和国际政治的各种变化，1997年12月，亨廷顿在其重新修订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一书中，对于“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开始有所变化，他在书中宣称：“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①，“多元化的世界是不可避免的”，“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②，等等。如果说这是亨廷顿对其理论的适调和修正，倒不如说这是他对自身理论的反思和“超越”。

全球文明倡议为中阿文明交流互鉴注入新动力*

丁俊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文明交流与友好往来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同阿拉伯国家走在了古代世界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前列。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始终是中阿交往的主旋律。”^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外人文交流与文明互学互鉴，中阿文明交流也进入提速升级、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为推动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不断注入丰富人文滋养。阿拉伯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彰显和平精神，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的中东文明发展趋势研究”（22JJD810032）的阶段性成果。

① [美国]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293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时代的中阿合作报告》（2022年12月），载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202212/t20221201_10983991.shtml?bsh_bid=5871530024，2023-10-28。

顺应时代潮流，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符合世界人民谋求和平发展的共同愿望；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对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启示借鉴意义，新时代的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具有更加突出的时代意义。

一 和平交往是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主轴

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同为古老的东方文明，各成体系，各具特色，底蕴深厚，影响深远，两大文明在交往交流、互学互鉴中不断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重要贡献。阿拉伯人民自古将中国视为文明之邦、知识之源，对中华文明心怀敬慕，心向往之。“求知吧，哪怕远在中国！”这句据传为伊斯兰教先知所说的阿拉伯古训在阿拉伯世界广为传诵。中阿文明交流源远流长，可追溯到 2000 多年前。中国汉代张骞、班固、甘英出使西域，就曾到过西亚阿拉伯地区。自张骞“凿空西域”、开拓出丝绸之路后，中阿人民就一直在这条文明交往之路上不断相逢、相知相交，共同创造了代代传承、绵延不绝的丝路精神。中国古代史籍《后汉书·西域传》中曾这样记述早期丝绸之路的繁盛景象：“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唐代时，中阿文明交流不断发展，人员往来持续频繁。史籍记载，自唐永徽二年（651 年）至贞元十四年（798 年）的百余年间，阿拉伯官方向唐朝遣使多达 40 次。^① 在民间，更有大量阿拉伯商人、使节、工匠、士卒等不断来华，以“蕃客”身份定居中国，学习中国文化，不断融入中国社会。宣宗大中二年（848 年），阿拉伯“大食国人”李彦昇还考取了进士。唐朝时来华的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在其《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述，当时仅在广州的阿拉伯等外籍人多达十余万人。^② 唐代杜环也曾在阿拉伯地区游历多年，并著《经行记》，详细记叙了当时阿拉伯的风土人情与社会风貌。

宋、元时期，中阿文明交流空前发展，相互了解进一步加深。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专列《大食诸国》卷，详尽介绍了阿拉伯地区风情。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两度远航，穿行阿拉伯海和红海，曾抵今日索马里、摩洛哥等地，并撰《岛夷志略》，详细记述了阿拉伯地区风物形胜。晚于汪大渊的阿拉伯旅

^① 江淳、郭应德著：《中阿关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年版，第 30 页。

^② （阿拉伯）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华书局，2001 年版，第 96 页。

行家伊本·白图泰也到访中国，并在其《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对中国做了详细记述，盛赞中国人民的勤劳与中华文明的智慧。有元一代，中阿文明交流空前深入。中国四大发明及制瓷、纺织等技术大量西传阿拉伯并远传欧洲；阿拉伯科技文化与人文科学也东传中国，元朝秘书监收藏的阿拉伯文献典籍多达数百部，涉及天文、历算、数学、医药等诸多学科，元朝天文台引进的阿拉伯天文仪器也有7种之多。明初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遍访海上丝路沿线诸多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今天的阿曼、也门、沙特阿拉伯、索马里、埃及等国。明、清之际的一批中国学者更致力于将“天方之学”与中华文明融会贯通，认为中阿两大文明“道本同源，初无二理”，二者义理相合，殊途同归，皆为“至中至庸、至和至平之正道”，^①将中阿文明交流互鉴提升至哲学高度。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曾提及这一重要活动，将其称为“伊儒会通”，并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以及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等相提并论。^②近代以来，中阿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列强的欺凌和压迫、争取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历史进程中，同呼吸、共命运，在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奋斗历程中携手互助，不断谱写出文明交往的新篇章。中阿文明交流的漫长历史昭示，和平交往是两大文明交往互鉴的历史主轴，堪称人类文明交而通、交而和的典范。

二 新时代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具有强大的现实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阿文明交流与友好交往开启崭新历史阶段，各领域交流合作日益拓展和深化。进入新时代，中阿合作与文明交流快速发展，动力强劲，成就突出，为推动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持续提供丰富人文滋养和精神资源。新时代的元首外交不断强化中阿政治互信，为中阿文明交流奠定坚实政治基础，发挥强大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包括中阿文明交流在内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鉴。2014年6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深入阐释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2016年1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的演讲中提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行动，确立和平、创新、引

^①（清）马注著：《清真指南》，郭璟、孙滔、马忠校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页。

^②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载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71页。

领、治理、交融的行动理念，并倡议建立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推进中阿双方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与文明交往互鉴；2018 年 7 月 10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讲话中宣布，中阿双方“一致同意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强调“文明的活力在于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上，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交相辉映。今天，我们要更多向对方汲取智慧和营养。”^① 2022 年 12 月 10 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阿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全面阐释了守望相助、平等互利、包容互鉴的中阿友好精神，提出了推进中阿务实合作的“八大共同行动”，其中包括“文明对话共同行动”。2023 年 3 月 15 日，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后，中国提出的第三份关于推进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倡议，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也为新时代中阿文明交流互鉴指明了方向和注入了动力。

在经济层面，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新时代中阿文明交流带来新的历史机遇，提供强劲发展动力。阿拉伯国家是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一带一路”倡议受到阿拉伯国家广泛欢迎。截至 2023 年底，中国与所有阿拉伯国家和阿盟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不少阿拉伯国家都积极谋划将本国发展规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在许多领域不断取得非凡成就，2022 年，中阿贸易额超过 4 300 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 30%，比 10 年前翻了一番。^② “一带一路”框架下汇聚了丰富多彩的中阿人文交流品牌活动。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双方已联合举办了 10 届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国已有数十所高校开设阿拉伯语专业，阿拉伯国家开设的孔子学院有 20 余所，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有数百所。“一带一路”已成为阿方学界、智库和媒体不断研讨交流的热门话题，阿拉伯政商学界人士对共建“一带一路”、对中国文化及中国治国理政经验都怀有日益浓厚的兴趣，高度赞赏和认同中国提出的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三大倡议，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为阿拉伯国家探索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重大启示和宝贵经验。中阿全面合作日益拓展和深化，为新时代中阿文明交

① 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载习近平著：《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年版，第 113～114 页和第 117 页。

② 翟隽：《在第四届中阿改革发展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http://www.chinaarabcf.org/zagx/zajw/202309/t20230930_11154020.htm，2023 - 10 - 29。

流互鉴带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

三 新时代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中阿两大民族有着相似、相同的历史遭遇，中阿文明拥有许多共同共通、相似相近的价值理念，两大文明关于人类平等尊严、文明和衷共济以及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等一系列伦理思想高度契合，和为贵、和而不同等文化理念使两大文明始终保持交而互通、包容多样、和谐共生的良性交往。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讲：“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近代以来又都在时代变迁中经历过曲折，实现民族复兴始终是我们双方的追求。”^①“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各成体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核心理念和共同追求，都重视中道平和、忠恕宽容、自我约束等价值观念。我们应该开展文明对话，倡导包容互鉴，一起挖掘民族文化传统中积极处世之道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②新时代的中阿文明交流互鉴，致力于探索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形成更多交汇，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人文滋养和精神资源，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

新时代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阿文明交流互鉴活动，“从彼此古老文明中汲取智慧，共同弘扬‘重和平、尚和谐、讲信义、求真知’的文明真谛。我们在‘文明冲突’的鼓噪中守正不移，共同倡导文明对话，反对文明歧视，守护世界文明多样性。”^③共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东方古老文明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断丰富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携手共铸世界文明和合共处之道，不仅为增进中阿民心相通、助力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动力，而且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不同文明交而通、交而和的伟大智慧，为当今世界文明交往互鉴、美美与共树立了榜样。^④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

① 习近平著：《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25页。

② 同上书，第323页。

③ 习近平：《弘扬中阿友好精神 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在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九日），载《人民日报》2022年12月10日。

④ 丁俊：《新时代中阿文明交流根深叶茂》，载《光明日报》2022年12月10日。

时代潮流，同时，“文明中心论”“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的偏见依然根深蒂固，各种极端势力不断在不同文明间制造新的断层线，国际话语霸权持续鼓噪和散布“中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伊斯兰恐惧症”等谬论。面对时代挑战，新时代的中阿文明交流互鉴，赓续历史传统，秉承丝路精神，共同践行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文明交往理念，广泛凝聚和平发展共识，激发变革创新动力，创造合作共赢机遇，“为变乱交织的世界不断注入稳定性，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新希望。”^① 新时代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伟大实践，必将在世界文明交往史上谱写出和合共生的新篇章，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推动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奉献更多东方智慧。

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中非文明互鉴走向纵深*

李洪峰

2023 年 3 月 15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讲话，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这个关于构建新型文明关系的新倡议依托着中国数千年来对文明内涵的理解、对交流作用的认知及对达成共识的重视，是中国历史和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理念发展，也凝聚着中国参与国际交往与合作的深刻体验。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是理论的来源，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在支撑全球文明倡议提出的各种理论和实践经验中，中非文明互鉴是兼具独特性和示范性的组成部分。中非文明之间存在着相通性、互补性^②，二者之间的互动互鉴为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相处和融通提供了参考，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传播和广泛

* 本文系 2022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课题“新时代海外‘中共观’研究”（22JZD023）的阶段性成果。

① 翟隽：《在第十届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 年第 6 期，第 5 页。

② 李安山：《释“文明互鉴”》，载《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第 45 页。

接受也将为中非文明互鉴进一步走向纵深提供新的动力。

一 中非文明互鉴在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中成为典范

中非两大文明从古代就跨越遥远的地理距离开始交流接触，相关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唐朝。^① 中非文明在价值观和哲学方面存在相似之处，都推崇集体力量与和谐共处的价值。南非学者谭哲理认为，中国的“中庸”思想传递了谋求共识、避免对抗的主张。^② 非洲国家独立以来坚持合作伙伴多元化的路线，呼吁自主选择发展道路，这也充分反映了非洲发展理念中的自主性、多样性及包容性特征，反映了非洲人民对外来文化和有益经验的开放度，这与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传统相一致。

60 多年来的中非平等互利合作充分体现了双方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尊重和对文明平等的认知。20 世纪下半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中国立场坚定地支持非洲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中非同样经历过被入侵和殖民的苦难，坚决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优劣观，在对民族解放的共同追求中逐渐加强对彼此的了解，注重知华友华、知非友非。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开启对于非洲历史、非洲文化、非洲政治、中非合作相关的学科体系建设和学术研究，周恩来总理还亲自指示将非洲语言文化教学纳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为此后的中非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随后，电影、电视、艺术演出、展览、出版、研讨、旅游等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向非洲讲述中国，向中国介绍非洲，搭建民心相通的桥梁。非洲方面，随着各民族解放运动、非洲一体化建设的发展和 21 世纪国家发展战略的不断成熟，非洲的文化认同诉求和国际文化地位诉求不断提高。非洲人民努力展现自身文明对世界的贡献，并加速与其他大洲文明之间的平等交流。在此过程中，非洲加大了与中华文明的互动，既提升了自身的话语权，又在世界文化图谱中鲜明展现了自身的文明多样性，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21 世纪以来，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推动下，中非交流更是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各大科研机构及高校推动的中非联合研究项目加速了中非之间的学术互动和观点交流，联合产出的各类成果也提升了世界其他国家地区人民对中非合作的了解和认

^① 张宏明：《中国的非洲研究 70 年述评》，载《中国非洲学刊》2020 年第 1 期，第 127 页。

^② 谭哲理：《在新世界秩序形成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当代世界》2019 年第 4 期，第 46 页。

识。近年，中国非洲研究界译介引进非洲学者优秀研究成果的努力，成为中非共建知识共同体、话语共同体的亮点，体现了中国对非洲思想成果的重视。

中非文明互鉴并不止步于知识和认知层面，而是进一步与实际的发展战略和合作规划融为一体。文明互鉴的最终目的是各国人民走向共同繁荣。从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到 2021 年的《达喀尔行动计划》，再到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加入金砖国家，中非文明互鉴的实践为中非共同发展提供了人文基础和情感动力，为推动更合理的全球治理与合作格局的出现做出了贡献，成为国际合作中知行合一、言行合一的典范案例。

二 全球文明倡议为中非文明互鉴提供新动力

在风云涌动的国际背景下，不同类型的冲突仍然干扰着全球和谐共进的节奏，文明、历史、思想、理念、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持续带来莫大障碍，即使是友谊坚固的中非关系也仍然面对来自意识形态和跨文化交际等层面的挑战。在人类为复杂而尖锐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人类共同价值的定义和不同文化的融通显得尤为关键，影响着问题解决的理念、路径和协作方式。全球文明倡议基于历史经验和当下现实，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从 4 个维度为消除分歧、减少敌对提供了思路，也为一直以来共同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民主、自由的中非文明互鉴实践注入了新的动力。

全球文明倡议肯定了中非文明互鉴实践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原则。对文明多样性的尊重，不能停滞于部分西方人对非洲文明表现出来的表面支持^①，更多的要体现为从文明理念和发展理念上的互解互谅，反对俯视轻视，反对强加于人。中非文明互鉴将继续坚持既有原则，推动全球文明的互学互补，不动摇，不偏航，共同为世界发展贡献力量。

全球文明倡议突出文明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性，为中非文明互鉴的前景指明了关键所在。在坚持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谋求文化的创新发展，一方面有利于中非各自的文化道路在新时代的演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非文明互鉴的集体实践产出更多示范性成果。塞内加尔学者谢赫·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认为，探讨非洲现代性必须以非洲复兴为范式框架，为此非洲要

^① 朱振武、李丹：《非洲文学与文明多样性》，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8 期，第 176 页。

重新获得历史主动性，掌握历史主动性的民族才能够创造自身存在所需的物质和非物质条件，而这需要创造力、发明力和创新力。^① 中非关于创新的共识符合双方利益，也是未来中非命运共同体凝聚力的源泉。无论在物质维度还是非物质维度，创新都离不开合作。新时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文化形态多元化提供了支撑，为文化的传承、发展、进步带来了机遇。基于过去数十年积聚的互信和相知，中非可以在各个文化领域开展创新合作，并且用开放的态度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带动各国文化的非排他性交叉互动。

全球文明倡议还将进一步推动中非文明互鉴经验在全球的广泛传播。自古以来，世界各地人民通过信息流动、文学传播、人员交往等各种渠道，分享经验，互通有无。随着全球文明倡议所获关注度和认可度的提升，中非文明互鉴作为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合作对话、发展中国家携手共进的典范案例，将带动更多国家根据合作伙伴的文化特点和发展特点加大沟通力度，消除认知隔阂，减少“文明冲突论”的负面效应，为全球的和谐发展带来新的思路和创意。

三 中非文明互鉴向纵深发展的愿景

全球文明倡议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拓展了新的实践路径。^② 中非文明互鉴必将继续体现对自主选择文明发展道路、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尊重，与中非政治经济合作融为一体，互相成就。未来，中非文明互鉴向纵深发展可从以下三方面着力。

第一，在哲学思想和发展理论建构方面互学互鉴。中非文明互鉴的深化需要依托对彼此的深层次认知。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普遍规律的学问，具有贯通百学的特点。由于受到历史原因和语言差异的影响，中非哲学的比较和互动尚缺乏积淀，也未能在学界和思想界拥有应有的影响力，是中非文明互鉴未来内涵式发展过程中应加强的重要环节。“中国与非洲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各自精神文化传统中可以找到一些相通或相近的方面，中国哲学和非洲哲学在当代的复兴都具有民族振兴和提升民族文化自信的意义”^③，对非洲哲学、

① Jose Do Nascimento, *La pensée politique de Cheikh Anta Diop*, Editions L' Harmattan, 2020, p. 147.

② 洪向华、冯文燕：《全球文明倡议：立论基础与多维价值》，载《对外传播》2023年第8期，第15页。

③ 徐克谦：《全球文明倡议下中非哲学会话比较的若干思考》，载《西亚非洲》2023年第3期，第50页。

非洲历史学以及非洲当代发展理论探索的研究和跟进，有助于从融汇古今的视角理解非洲现象及其国际合作需求。进一步而言，中非哲学在当代的复兴以及二者之间的话语及思想合力在消除“西方中心论”负面效应的同时，将带动全球文明对话框架内的哲思互动。从理论探索的角度看，中非现代化道路思想和理论探索都需要从他者经验中汲取养分，为本国本地区的现代化提供思想、理论、制度、道路的启示与借鉴；同时，未来中非合作提供的新概念、新思想和新理论，也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融入全球发展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推动全球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第二，在文化创新合作方面持续开拓。中非文明互鉴实践应给予非洲文化创新以更大的支持。目前，非洲文化发展的道路仍然艰辛，受到文化领域财政预算投入不足、文艺和管理人才缺乏、科技手段薄弱、全球影响力有待提升、非传统安全风险高等诸多因素的束缚。作为非洲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中国一直以来对非洲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明遗址的维护和修缮、文化活动的组织、学科专业发展等方面努力提供了各类支持。未来，中方仍需基于授人以渔的理念，进一步在文化领域的人才培养、技术培训和管理经验等方面对非提供协助，以知识和理念交流助力非洲文化传承与创新。此外，中非人文交流合作的广度、深度和覆盖度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在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媒体、智库、青年、妇女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需要更好地调动中非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群体的参与，兼顾对象国的首都和其他区域的平衡发展，夯实中非关系的社会民意基础，展现中非优秀文化，加强民心相通，在交流中找到新时代国际文化创新合作的生长点。

第三，在经验传播和分享路径方面与时俱进。中非文明互鉴的理念和实践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关注，但是如何做好诠释、宣介以便更好地被理解和借鉴，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在融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全球文明倡议将引领中非文明互鉴的话语构建充分突破“西方—东方”的二元结构思维，为此需要充分利用好各类传播平台，突出智能化和数字化路线，回应国际关切，既呈现中国立场和非洲立场，也基于关照人类共同命运的目标进行话语传播，凸显中非文明互鉴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意义。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